

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城市社区治理效能

■胡灵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城市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党的执政根基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品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绝非简单的“组织覆盖”或“政治表态”，其深层逻辑在于将党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然而，这种转化并非自动完成，它需要在治理过程的关键环节实现系统性的功能嵌入与融合。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通过以党组织牵头调研夯实治理的信息基础，以有序协商凝聚多元主体的治理共识，以制度创新将有效实践沉淀为长效机制，最终实现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从“组织在场”迈向“治理有效”。党组织牵头调研夯实治理的信息基础，破解社区治理中的信息失灵问题。城市社区的“陌生社会”“居民个体原子化”属性使得个体诉求天然分散、碎片化，缺乏组织化的表达渠道。党组织牵头深入居民调研，能够将分散的民情信息汇聚起来，使治理决策建立在真实而非想象的需

求之上。从理论上讲，党组织牵头调研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代替群众想”，而是在于“保障群众的声音被听见”。传统的行政化信息收集往往依赖于台账报送和被动接访，其信息传递链条长、失真率高，且倾向于过滤掉“不紧迫但真实”的民生诉求。

余杭街道华坞社区的垃圾投放点重建，提供了一个从“信息失灵”到“信息感知”的微观样本。一场意外火灾让垃圾投放设施受损，物业计划原址重建，却引发低层业主与高层业主的激烈对立——低层住户心有余悸要求移位，高层住户则不愿多走几百米。面对这道棘手考题，社区党组织没有急于表态，而是选择了倾听。由网格党员、社工、志愿者组成的攻坚小组分片包楼、错峰上门，用整整3天走访112户相关居民，理清了安全、选址、运维、便民四大类76条诉求。最终将一场可能滑向对抗的情绪化争执，重新拉回到真实诉求上，为后续协商提供了共同的事实基础。用有序协商凝聚多元主体的治理共识，化解社区治理中的利益分化难题。城市社区的利益分化是客观现实，如同一栋楼里，高层住户与低层住户

对加装电梯的态度可能截然相反；同一小区内，不同楼栋对公共空间改造的诉求未必一致。从理论视角看，有序协商就是让“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共识能力。党组织的政治权威为协商提供了初始信任，党组织的组织网络为协商提供了参与动员的条件，党组织的协调能力为协商提供了利益平衡。有序协商的核心要件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其一是“有平台”。党组织搭建协商载体，使分散的意见有处可诉、有序可循。南安社区依托“幸福红立方”工程，牵头搭建了社区、业委会、物业三方协同议事平台，组建了“加梯帮帮团”，有效解决了凤兴一区小区4幢3单元拖了3年的加梯项目问题。山西园社区党委牵头，召集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物业召开多方联席会议，敲定“物业先行垫资维修”的处置方案，紧急破解电梯停摆维修应急问题。其二是“有规则”。协商不是无序争论，而是在明确的议事规则下进行。通济社区党委通过“聚力、聚智、聚心”的“三聚工作法”，定期召开专门协商电梯维护责任的议事会，重点解决加梯之后由谁来管的长效维护的问

题。其三是“有反馈”。协商的结果必须能够进入执行环节，否则协商便沦为空谈。上文山社区上城悦之城小区在新物业入驻后，落地执行秘书制度，每周一、周三驻点办公，负责记录业委会会议、监督物业工作，将相关内容整理更新至“备忘录”，保障业委会决议和业主诉求落到实处。

以制度创新将有效实践沉淀为长效机制，推动社区治理走向制治常态。治理不能依赖“运动式”攻坚，也不能寄望于“能人效应”的持久化。将实践中验证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使治理效能从“偶然”走向“必然”，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从理论视角来看，制度创新的意义在于将成功的互动模式“编码”为可重复调用的规则，降低其后续治理的系统性交易成本。社区治理中大量精力消耗在重复性的协调、说服与监督上，如果每一次物业更换、每一次加梯协商都从零开始，治理效率将极其低下。

余杭街道在社区、物业管理方面的制度创新具有典型意义。针对物业履职缺乏硬约束的普遍性难题，街道层面成立了物业服务行业自律联盟，由

辖区34家物业公司共同组建，并制定了《余杭街道物业服务人重大履约事项备忘录》，对设施设备维护失责、资金使用违规、项目选聘失信等重大履约失责行为进行记录，被记录单位将在24个月内被列入街道内项目选聘、评优评先的不建议对象。与备忘录机制相配套的执行秘书制度，则从另一个维度补充了制度体系的完整性。余杭街道物业管理综合服务中心旨在通过专业社会组织的实体化运营，吸纳和培育相关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力量，向小区业委会输送配置执行秘书，承接协助业委会选举、规范履职培训、日常事务运营等工作，在辅助业委会成员履职基础上，推动了自治决议从“纸上”落到“地上”。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命题，不是党组织“做多少事”，而是党组织如何通过调研感知、协商聚力与制度沉淀，使社区治理系统获得自我运行、自我调适、自我提升的能力。当治理从“依赖能人”走向“依赖制度”，从“运动式响应”走向“常态化运作”，党建引领便完成了从“介入”到“催化”的功能升级。（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余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壮大历史经典产业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张 晖

历史经典产业承载着传统技艺和文化记忆，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立足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进行系统谋划，为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历史经典产业大多发轫于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诸如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等产业，天然根植于乡土资源，其原料种植、技艺传承、产品加工等环节均与乡村发展深度交织，是推动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大力发展历史经典产业，不仅能够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而且能够拓宽就业渠道，完善产业体系，全面赋能乡村振兴，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

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然而，产业链价值链延伸不足、传统技艺与现代需求衔接不够、联农带农机制不够健全等短板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把握时代发展要求和产业演进规律，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一方面，发挥历史经典产业作为强村富民载体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乡村振兴中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实现“蝶变”，二者相互赋能，协同发展，有机地统一于社会建设之中。

历史经典产业作为乡村产业中极具成长性的优质业态，以种养基地保障原料供给、以环节贯通承载工艺转化、以文旅服务延伸消费场景，从而完成全链条生态的构建。在未来，一是巩固产业源头，高标准推进丝绸、茶叶、中药材、酿造等原料基地高端化、智能化、规模化、绿色化建设，把原料基地建设成为产业持续发展的“第一车间”；二是贯通生产、

加工、研发、设计、销售、服务等环节，实现产业链的延展，提升价值增值空间，打造上下游协同的高效供应链网络，促进历史经典产业“强筋壮骨”，为实现产业迭代升级奠定基础；三是拓展产业边界，打造“产品+体验+旅游+文化”复合业态，通过构建农文旅融合新场景，“以产促旅、以旅彰产”，实现产业增效与农民增收的同步推进。

守正创新，是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历史经典产业创新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传统技艺在当代乡村沃土焕发发生机的现实需要。建立数字化档案，将口传心授的匠人“绝活”转化为数字资产，实现产业传统技艺的“数字保鲜”，并为适配现代乡村消费场景奠定数字基础。同时激活产业动能和发展活力，以物联网、传感技术改造传统生产场景，实现关键工艺参数智能监测与精准管控，打造智慧茶园、数字化酿造车间、智能中药材种植基地等示范载

体，推广智能种养、质量溯源等技术应用，推动传统业态转型升级。还要为历史经典产业注入“创新基因”，既坚守传统技艺内核，又兼顾当代审美取向与生活方式，开发兼具文化底蕴与时代气息的产品与服务，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占据主动。

品牌建设是历史经典产业实现价值跃升的关键所在。要把质量作为品牌建设生命线，主动适应消费升级趋势，准确定位品牌核心价值，通过文化创意、跨界联名、数字营销等方式增强品牌吸引力。充分发挥老字号、地理标志、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源优势，培育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构建梯度清晰的品牌矩阵，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能力。还要善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充分挖掘并广泛传播历史经典产业蕴含的丰富文化价值，以“特”“优”战略让传统品牌“潮”起来、“活”起来，持续扩大市场影响力和消费群

体覆盖面。

历史经典产业植根“三农”，深厚的共生关系使得其持续发展必然要紧扣产业富民导向。一方面，从产业发展壮大实际需要出发，吸引传统技艺人才、乡土手艺人、返乡创业者深耕历史经典产业发展，并从技能培训、利益联结、主体赋能、制度保障四个维度推动其深度嵌入产业链条，带动其增收致富，从根本上增强农民参与和推动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激发龙头企业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引导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通过订单收购、保底分红、股份合作等方式，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此外，要引导农户盘活庭院、闲置农房等乡土资源，发展特色民宿、手作体验等特色业态，让农户获得持续收益，促使历史经典产业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广大农民，激发乡村全面振兴新活力。（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